

康熙西巡五台山若干问题探析

王敬雅

内容提要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间，曾经五次寻访五台山，关于其原因和过程，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本文以康熙朝《起居注》和康熙朝《实录》为基础，参照五台山地方志书、碑文及时人诗作、笔记等史料，厘清每次出行的背景，揭示出行背后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 康熙 西巡 五台山 藏传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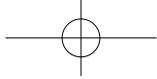
四方巡行，是中国古代内圣外王、以礼化天下的治国方略之一。关于清代皇帝的出巡，清史学界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主要集中在乾隆时期，而关注的重点也在皇帝的南巡上。在2008年康熙朝《起居注》出版前，史料所限，对于康熙皇帝西巡五台山的研究并不丰富。本文旨在梳理康熙皇帝西巡五台的具体时间、过程，并根据时代背景，探讨其数次西巡的目的和意义。

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康熙西巡五台山一共有五次，《实录》与《起居注》记录没有出入，分别是：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十二到三月初六；二十二年九月十一到十月初九；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到二月二十二；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八到二月二十八；四十九年二月初二到三月初四。

初看资料，康熙帝五次五台之行有相似之处，但是仔细分析，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释：第一，康熙皇帝首次寻访五台山的确切时间是否为官方记载的康熙二十二年初；第二，每次巡行的路线都有不同，原因何在；第三，从时间上来看，一、二次相隔仅半年时间，而第二次与第三次之间缘何相隔十五年之久；第四，康熙四十九年最后一次西巡五台之后，再没有过长途的巡行，这次巡行是否有其特殊意义。以上种种问题，我们将在下文中逐一加以讨论。

一 第一次西巡五台山及其时间

在官方记载中，康熙皇帝第一次西巡是二十二年二月十二自京城出发，三月初六日回到紫禁城。此次巡行历时二十五天，由京西南出，过涑水、易州、满城、唐县，由阜平入龙泉关，在菩萨顶驻蹕四天后回銮。回程出唐县向南，过庆都，经清苑、新安、任丘，乘船至霸州苑家口，取道信安、永清，最后由南苑回宫。



《扈从西巡日录》¹是我们了解此次行程的主要史料，其作者为当时的詹事府詹事，著名的汉族学者高士奇。在高的笔记中，不但记录了他扈从皇帝游览五台山时的具体行程，还记载了沿途风土人情。由高士奇的叙述来看，此行确有观风游乐的目的。

《清凉山新志》中则详细记载了皇帝于五台山进行的宗教活动，主要是在菩萨顶为太皇太后修延寿无疆道场三日，赏赐清凉老人老藏丹贝龙袍、貂座等物，同时遍赏“合山番汉僧俗军民人等”，并命令地方官员“栽培树木，壮丽名山”²。

虽然所有官书中，都记载着康熙皇帝首次造访五台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二年，但是翻看五台山碑文，我们却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³：

“御制菩萨顶大文殊院碑文”，作于康熙十年（1671），中有“朕西巡驻蹕兹地，因词词于石”；

“御制碧山寺碑文”，作于康熙十年（1671），中有“朕亲来佛地，藉祝慈禧”；

“御制台麓寺碑文”，作于康熙十年（1671）三月十八日，中有“朕永惟佛教之宏深，欲跻群生于仁寿。巡幸驻辇，式礼香林”；

“御制罗睺寺碑文”，作于康熙十二年二月（1673），有“朕省方观民，所过名山大川……尝一再至五台山，慨然于清凉真境，如游崆峒汾水之间”；

“御制显通寺碑文”，作于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677），中有“朕驾銮辂以时巡，望鹞峰而企”；

“御制殊像寺碑文”作于康熙十九年（1680），中有“朕慈闱祝厘，故尔法驾戾止”。

从这些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在二十二年之前，不止一次到过五台山游览。但是遍查《圣祖实录》和康熙朝《起居注》，都不见相关记载。更为奇怪的是，同样一篇“御制罗睺寺碑文”，在清代官修的《清凉山新志》中，日期从本来的“康熙十二年”被写为“康熙四十五年”；而在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圣祖御制文集》中，日期则被记为“康熙四十九年”。上述提及的其余各碑文，有些没有被收录到官修文集之中，有些在收录时则没有注明日期。

这些碑文的日期因何被故意涂改，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不过通过现有的史料，我们可以知道，至晚到了乾隆时期，圣祖首次西巡发生在康熙二十二年这一说法已成定论。此后，官方的文本虽被

¹ （清）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二一八，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² （清）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三，页182—195，《中国佛寺史志总刊》第三辑，第30册，丹青图书公司印行，1985年，以下版本同。

³ 碑文选自周振华主编：《五台山碑文匾额楹联诗赋选》，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以及《五台山研究》杂志诸文，兼与照片比对。



修改，但是碑刻上的日期却依然存留。个中原因不得而知。

二 第二次西巡五台山及其目的

第二次西巡的时间在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十一到十月初九，距离前次仅隔半年。但是这半年间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之事，即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郑克塽向皇帝递上降书，并于八月十八剃发，至此，前明的抵抗势力基本荡平。

康熙皇帝一生都不曾表现出对于佛教的热爱，而在一年中两次西巡五台，其原因又是什么呢？高士奇曾经说康熙二十二年初西巡五台的原因是，“我后展遐瞩，乘时此西临”¹；朱彝尊也在诗中写道：“省方岂为寻沙界，特采天花寿两宫。”²也就是说，皇帝第一次西巡，是遵从太后（或者太皇太后）的旨意而来的。

对于第二次出巡五台的目的，《起居注》中特意记载³：

皇上纯孝性诚，体养睿念，遂于春二月躬诣台山，致祈景福。时上亲睹岭路危险，车驾既还，即命工部诸臣，凡径路偏侧，桥梁圯坏折，悉董率修治……仍留内大臣，国舅佟国维、公福善率侍卫等于后，沿途葺理，无非曲承太皇太后瞻礼五台之素心，以求上慰圣怀，茂绥蕃祿……自此太皇太后之夙忧得以毕展，皇上敬顺太皇太后之至意无所不周。慈孝相成，神人胥悦，真史册中希见之盛事也。

孝庄为蒙古科尔沁部族人，而“蒙地喇嘛教势力至为普遍，一般生活习尚，如婚丧疾疫，以及思想行为，莫不受其支配。全体人民，上自王公台吉，下至编户平民，莫不虚心供奉。无论贫富之家，或土居，或幕徙，莫不有佛龕之设备，朝夕顶礼。每饭不忘”⁴。五台山自明代起便确立了其内地黄教中心的地位，孝庄皇后欲赴五台礼佛，也是在情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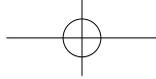
在康熙皇帝五次西巡中，唯独此次与太皇太后同行，一路侍奉殷勤，极尽孝道，直至康熙晚

1 前揭《扈从西巡日记》，页27。

2 （清）朱彝尊：《驾幸五台山恭纪三首》，选自《五台山碑文匾额楹联诗赋选》。

3 《康熙起居注册》第二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甲午。

4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伊盟左翼三旗调查报告书》，选自《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远方出版社，2007年。



年，他还会提及自己此次的孝行¹¹。此时台湾已复，天下初定，皇帝奉亲大举西巡，必有表率天下之用心。

康熙皇帝与其祖母于九月十一日自京城出发，第三天“以路险先往验看，留裕亲王、恭亲王常宁随太皇太后”。皇帝于九月十九日到达菩萨顶，三日后回至龙泉关迎太皇太后驾。因长城岭至菩萨顶一段道路险要，皇帝于二十三日至长城岭先行试辇。二十四日，太皇太后驾临，因险不可登，太后谕返，皇上代为礼佛进香，而自回龙泉关，由裕亲王福全扈从先行返京。皇帝复返菩萨顶，驻蹕二日后，于九月二十七日起驾还京。四日后于曲阳县追及太皇太后，奏五台诸寺代礼毕，遂合一处，于十月初九日返回皇宫¹²。

综观此次西巡，的确存在一些特别之处，不过从皇帝张行孝道的角度来看，这些特点也是合理的。

第一，从随行人员来看，在五次西巡五台山的过程中，仅有本次的起居注官员中选用了汉人，而且还是当时名望很大的张玉书。从《起居注》的记载来看，张玉书与牛钮二人，除了在当地举人进献《射虎川记》后传阅此文外，皇帝的日常咨政事务，还是由扈从学士阿兰泰、石柱、图纳三人担任的。我们上面引用的一段溢美之辞，很有可能就出自张玉书之手。

此外，《起居注》与《实录》中都没有阿哥们扈从的记录，而此次随行的王公则是裕亲王福全与恭亲王常宁，二位亲王一路上都侍奉于太皇太后身边，国舅佟国维、公福善等内臣则扈从皇帝左右。

第二，从路线上来看，此次西行的去程并没有像上次一样，从京南绕一个大圈，显然事前经过了精心的安排。从前次记载来看，皇帝在西巡五台山的路上，顺路省察了京畿地区的民情。而此次皇帝因要先行探看所修道路，而与太皇太后在京西董家林分别，之后径直经完县、曲阳而至阜平，只用了六天就到达了龙泉关。回京时，考虑到太皇太后驾行迟缓，皇帝便取道曲阳、满城而至易州，由定兴经涿州、良乡回京，于是便大大缩短了归途的路程。

第三，《起居注》在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甲申中记载，皇帝于本日下旨“自明日起，扈从人员勿射生”。此行志在“曲承太皇太后瞻礼五台之素心”，进入阜平界内后下令禁止杀生，十分合乎情理。之后归程中，皇帝及其侍从的射猎活动也是在驾出阜平之后¹³。但是上次西巡时，还未出五台本县，皇帝便射殪了一只老虎。可见皇帝此次与祖母同行礼佛，便在行为举止上多了一些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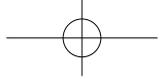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不过此次出行的记录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

第一，对于为何在一年中两赴五台，《起居注》中的解释是：“于春二月躬诣台山……时上亲睹

¹¹ 《庭训格言》“体贴君亲忠出至诚”一条中，康熙回忆到：“昔日太皇太后驾诣五台，因山路难行，乘车不稳，朕命备八人暖轿。太皇太后天性仁慈，念及校尉请轿步履维艰，因欲易车。朕劝请再三，圣意不允，朕不得已，命轿近随车行。行不数里，朕见圣躬乘车不甚安稳，因请乘轿，圣祖母云‘予已易车矣，未知轿在何处，焉得既至？’朕奏曰：‘轿即在后。’随令进前。圣祖母喜极，拊朕之背称赞不已曰：‘车轿小事，且道途之间，汝诚意无不恳到，实为大孝。’盖深惬圣怀而降是欢爱之旨也。”

¹² 以上据《康熙起居注册》第二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初九日。

¹³ 《康熙起居注册》中记：“九月二十九日，赏内大臣文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赐内阁、翰林院官野兔、兔各一。”因为前一日，赏扈从内大臣、侍卫及部院衙门官员的还只有木碗，所以可以推知，这些赏赐品均是狩猎所得的。



岭路危险，车驾既还，即命工部诸臣，凡径路偏侧，桥梁圯坏折，悉董率修治。”也就是说，康熙皇帝年初的巡行，是其祖母前往五台山的先期准备，也就是为第二次五台之行探看道路。

但是，皇帝第一次西巡与第二次西巡所行的并非同一路线，探看道路之说似不成立。而且如果此时京师至五台的道路已经修葺六月之久，又经佟国维、福善率侍卫临时修葺，那么为何最后太皇太后驾临之时还是险不可登。

第二，《清凉山新志》是清代乾隆时期官修的五台山地方志书，其中对于历代皇帝对于五台山的赏赐和在五台山进行的道场、法事，记载都颇为详细。但是对于九月的这次西巡，记载只有“驻蹕于菩萨顶虔修道场三日”¹，其余赏赐诸事与前次基本相似，而对于太皇太后驾临和皇帝后复回菩萨顶驻蹕只字未提。

第三，在乾隆朝修的《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一一中，记载同行的并非孝庄文皇后——也就是《起居注》中的“太皇太后”，而是孝惠章皇后。作为一部官修政书，有此纰漏着实令人费解。康熙间的著名满洲才子纳兰性德，作为随行侍卫事后曾有诗句曰：“共传天子孝，亲侍两宫来。”²而康熙时期所谓的“两宫”，所指的就是太皇太后与皇太后二人。

这些疑点的存在，令人不禁生出以下疑问：第一，康熙皇帝此行的目的是否像他所说的一样，仅仅是陪同祖母入台礼佛；第二，与康熙皇帝同行五台山的，是孝庄文皇后一人，还是她和孝康章皇后二人。

纳兰性德在《宿龙泉山寺》中，有“既闲陵阙望”一句，被后人当作顺治皇帝出家五台的证据之一，而上述疑点的存在，又使人不禁对康熙皇帝到访五台山的目的产生怀疑，为“顺治出家”说提供了新的旁证。

三 第三次西巡五台的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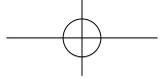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正如前文所说，康熙皇帝一生对于礼佛一事，远没有他的子孙那样积极。康熙二十六年底，孝庄去世，没有了祖母的嘱托，皇帝便停止了西巡的活动。这期间，正是朝廷中儒臣们最活跃的时期，以李光地、张玉书、徐乾学、汤斌、陈廷敬、高士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几乎日日进经筵，讲义理。可能正是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康熙皇帝自二十七年三月，下旨令裕亲王福全在菩萨顶为刚刚薨逝的太皇太后最后做了一次“慈恩道场”之后，便停止了对于五台山的赏赉³。

事隔十五年之后，是什么原因让康熙皇帝下旨再次西巡呢？

① 前揭《清凉山新志》卷三《崇建》。

② （清）纳兰性德：《驾幸五台山纪》，录自《五台山碑文匾额楹联诗赋选》。

③ 据《清凉山新志》卷三《崇建》，康熙二十七年到三十七年间，只有皇太后、皇太子和七阿哥三人向五台山赍送了钱物。



在二十二年收复台湾之后，帝国便进入了一个相对承平的阶段，此间虽有俄罗斯南扰一事，但是对国家稳定影响很小。翻阅《实录》，我们发现康熙皇帝此时的为政重点放在了协调满汉关系、整饬吏治以及治理河工之上。对于内蒙古的管理，以每年的北巡为主要方式。与西藏达赖喇嘛之间，也并没有建立明确的统属关系。

但是之后不久，噶尔丹时时扰边的问题便出现了。顺治皇帝曾说过：“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¹康熙二十九年，圣祖第一次亲征噶尔丹之后，康熙皇帝开始发现，西藏与蒙古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而其中的纽带，就是宗教。

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但第巴桑结嘉措秘不发丧，仍借五世达赖之名发布政教命令，其间由于第巴暗中支持噶尔丹，还爆发了准噶尔部与喀尔喀蒙古的战争。喀尔喀战败后在哲布尊丹巴的带领下南下归附清朝。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举行，正式承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喀尔喀蒙古的宗教领袖地位，使其成为继达赖喇嘛、班禅之后的藏传佛教第三大转世活佛。

康熙皇帝于三十二年后多次召班禅进京未果，康熙三十六年，皇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兵败而亡。康熙帝大胜回京时，外蒙古大喇嘛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奉诏在张家口外的布尔噶苏迎驾，并随驾回京。在康熙三十五年西征过程中，皇帝得知了五世达赖早已圆寂，第巴发现匿丧事件败露，仓促迎请秘密寻找的转世灵童仓央嘉措于康熙三十七年正式坐床²。

此时，在内地建立一个藏传佛教中心以协调蒙藏与中央的关系，便显得极为紧迫。而选定五台山的理由，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十七年为《清凉山新志》所作的序言中已经阐明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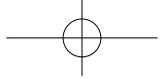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朕惟清凉山，古称文殊大士演教之区也。兹山耸峙于雁门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横临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风劲而高寒，层冰结于阴岩，积雪留于炎夏，故名清凉。然地虽寒，而嘉木芳草，蒙茸山谷，称灵异焉。五峰竦立，上耸霄汉，日月之所回环，烟霞之所亏蔽，苍然深秀，其为神阜奥区，盖自昔而已然矣。是以自汉迄今，历代皆有崇建，古刹精蓝，遍满岩岫。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嵋、普陀，而五台为尤盛焉。

此外，自唐开元年间不空三藏和善无畏、金刚智三人在五台建立密宗道场之后，五台山的密宗佛教便发展起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形成后，明永乐十三年(1415)，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来到五台山。他在五台山断断续续住了四年，为黄教修建了五座寺庙，将黄教传入了中原地区，而

1) 《清世祖实录》卷六八，顺治九年九月庚辰。

2) 以上转述自赛仓·罗桑华丹(王世镇译注)：《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3) 前揭《清凉山新志》“序”。一国之君为一个县的地方志作序，此事不仅在清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中也是极为少有的。



五台山也成为了内地黄教的中心所在。

康熙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启程西巡。皇长子、三子随驾，起居注官为阿山与揆叙。从《起居注》的记录来看，此次扈从协同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有大学士伊桑阿和学士辛保、温达三人，鸿胪卿席哈纳多次替皇帝传达旨意，此外，领侍卫内大臣富善、乾清门侍卫马武和侍卫关保多次负责对于地方武官骑射的检阅。

皇帝去时选择了与二十二年十月归程相似的路线。其出京西，经涑水、满城、完县、曲阳等地，从阜平入龙泉关。于五台山菩萨顶驻蹕三日后，往五台县白云寺驻蹕一日，而后经阜平、完县转至保定，于清苑县登舟，行水路过新安，于霸州登岸，经固安返京。

时隔多年之后，康熙皇帝再临五台，于菩萨顶举行了护国裕民道场，对诸寺大加赏赉。除了银钱绸缎等物，皇帝还赐予菩萨大喇嘛“敕封清修禅师”银印，令其提督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事。而且此处巡行中，皇帝特意提高了台麓寺的地位，不但是其内供奉内造佛像三尊，还将其内格隆班弟二十五人的薪俸提至与菩萨顶诸寺相同¹¹。

而此行最大的不同，便是康熙在五台山及五台县驻蹕的几日中，主要是与刚刚归附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其喀尔喀蒙古的瑚瑚脑尔亲王扎巴西图尔等共同活动。二月初九日，皇帝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瑚瑚脑尔亲王扎巴西图尔等入普济寺，令视清凉寺，又入南台、古南台等庙游览。二月十日，皇帝率哲卜尊丹巴等入妙德院等庙游览。二月十一日，康熙又率哲卜尊丹巴等入羽化池等庙游览。在辞别之时，《起居注》中有这样一段记录¹²：

赐食遣还，扎巴西图尔等奏曰：

臣等远处遐荒，一介微末，向慕圣化翔恰，时思瞻仰天颜，以僻居异域，无由自遂。忽承皇上念臣等祖父为累世输贡之国，遥颁圣谕，命臣等入覲，不胜忻跃，率属来朝。蒙皇上预拨驼马糒粮，沿途资给。臣一至都即招至御前，宣沛温纶，赐宴赐食，颁以上御衣帽黄带及银缎等物。复蒙优加拔擢，封授亲王。在京之日已极隆眷，豢养之周，诚为名言莫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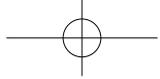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兹护随幸五台，俾臣得以常侍上侧，途中频沐赏，赐赉有加，无以遇叨圣主浩荡洪恩。一旦陛辞，犬马之诚，依依恋主，实难离去。

言毕，呜咽不能起，众前拽其手而出，涕泣至门外，垂马俯首，拭泪而去。

虽然《起居注》中的言辞显得有些夸张，但是细读此次五台之行的记录，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1> 以上根据《清凉山新志》卷三《崇建》。

<2> 《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十一日。



结论：

第一，刚刚归顺的瑚瑚脑尔亲王是应诏前往京城的，将其送至此处并令其由五台山返回，应该是康熙皇帝事先安排妥当的。扈从此行的学士温达，曾随圣祖西征，并作《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对喀尔喀蒙古事务颇为熟悉，将其带于身边咨政，也表明了皇帝行前安排很周密。

第二，从《起居注》上看，此行由京师直奔五台，而归程中却从南路绕回。而在去程中，《起居注》中除了日常召见和理政外，只有皇帝于涑水试射的一次记录，有些天甚至仅记了此日的驻蹕地点。本次的起居注官是阿山和揆叙，揆叙记录一向严谨，不可能因为主观原因减少记录内容。而翻查所经各县的县志，几乎没有对于本次西巡的记载。可见康熙皇帝此次西巡的去途选择了一条相对快捷的道路，而去程也相对保密，并未召集驻地官民，显然是因要事赶赴五台山。而归途中则照例沿途巡查民情。

康熙此次寻访台山后，五台山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黄教寺庙建设，之后完善的五台黄庙体系中，有达赖一系黄庙二十一座和章嘉一系黄庙六座，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内地最重要的藏传佛教中心。

四 第四次西巡五台及地方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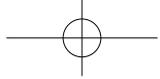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康熙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二十八日，康熙皇帝进行了第四次西巡，目的地仍是山西五台山。上命皇太子胤礽、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禛和皇十三子胤祥随驾，自畅春园启程，仍从京西南良乡、房山出，由涑水到易州，而后自满城、完县、曲阳至阜平县王快镇大营，由龙泉关入台怀。于菩萨顶驻蹕三日后，返驾至台麓寺、圣水寺，由平阳府经行唐县至真定府。之后，圣驾过无极、祁州、蠡县，由新安登船，舟行任丘、大城二县，于永清上岸，次日至南苑驻蹕，第二日返回畅春园。

此行扈从起居注官为法良、揆叙、阿金、傅森四人，由《起居注》的记载来看，法良与揆叙参加了行宫日常的政务处理。此行所带的咨政学士，有大学士马齐，学士傅伸、来都三人，平日传谕的依然是乾清门侍卫马武，而皇帝也时时差遣鸿胪寺卿沙拜往来问话。

此行去程与三十七年西巡相同，由北京到五台山共用了十一日，其间“上出行宫率皇太子诸皇子及内大臣侍卫射”五次，并一路向前来随驾的直隶巡抚李光地询问当地官员的优劣。回程所用时间比前次西巡多出六日，驾出五台后转向了真定府，绕行京南诸县而回。可见皇帝并没有急于回京，而是于京畿再行巡视。

皇帝于每年二月巡视京畿在康熙后期成为惯例，康熙四十年后，除了四十二年、四十六年南巡，以及四十三年、五十七年皇帝身体抱恙外，其余各年二月都有在京畿的巡视活动。所以，西巡归程中的活动基本与历次京畿巡行无异，皇帝阅视子牙河，召对地方耆老，考察地方政事，并频繁与皇子及侍卫停围骑射。

根据《起居注》和《实录》记载来看，康熙皇帝此行在五台山除了驻蹕于菩萨顶、台麓寺和圣水寺



外，主要还造访了罗睺寺、涌泉寺、碧山寺、广宗寺、妙德庵以及西台、南台各寺，并没有登上北台和东台。北台“台麓纤罗微动，即其上噫气鼓怒，行者率裹足”⁴¹，不便攀登，东台除望海寺外并无大规模佛寺，而此二处风景却都旖旎。皇帝放弃登临两处，说明他此次对五台山诸寺的礼拜和赏游是有一定选择性的。

为了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势力形成制衡，经过多年的沟通，康熙皇帝于四十四年敕封二世章嘉阿旺却丹为“灌顶普善广慈章嘉呼图克图大国师”，令其管理内蒙古、甘肃、青海、北京、多伦、承德、五台山以及华北地区的黄教事务，并给予敕印，此为敕封章嘉呼图克图之始。此后章嘉活佛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之下，陆续将五台山内的一些寺庙改造为黄教道场，他自己也选择了镇海寺作为驻锡之地⁴²。章嘉活佛驻锡五台可以说是五台山真正成为内地黄教中心的一个标志，所以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康熙皇帝此次出巡五台，除了礼佛外，主要的目的就是对于台怀寺庙的考察。

在此次的西巡中，还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即皇帝所经的地方开始出现了百姓“持香跪迎”的场景。前三次西巡的途中，虽然有皇帝与地方百姓的交流，但是这种有组织的迎送场景并未出现。如在二十二年二月的出巡中，有阜平百姓叩阍要求分县之事。之后康熙皇帝途遇村民负米豆，问之曰备太后巡幸之用，皇帝便使阿兰泰查之，知县赵晋继有“给价小民，以备不时”之语，上不深信，下旨令免。可见此时皇帝在路途中不但没有受到大规模的迎接，还会听到一些当地百姓的怨声⁴³。

而自康熙二十三年南巡后，地方的欢迎仪式便日渐隆重：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初八，当皇帝驾出龙泉关赴五台时，山西百姓数千人跪伏于行宫前，请建万寿亭诵经，并有各种果品进献，巡抚噶礼询其情由，转奏后，皇帝令伊都额真胡必图将果品各取少许，令诵经准行，建亭停止。

二月十二日，御驾出山西蔚州广灵等县，民数千人跪献万民衣，称“伏闻皇帝圣躬不憚劳苦，巡视西陲”，跪恳奏请亲近，一等待卫海青询问情由启奏，上曰：“朕于各处地方，此等对象概不收受，南方百姓兴尔，此地百姓感恩之意，朕悉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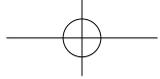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更为有趣的是，皇帝在赴五台山途中，从未受到过百姓的“持香跪迎”，但是回程中，御驾刚入直隶，“行唐县百姓闻知圣驾远临，跪献萝卜葡萄枣小猪鹅鸭鸡等物”。存住转奏后，奉旨：“朕需用诸物各自京师，于地方一无所取，因尔等诚心进献，葡萄萝卜各取少许，谕毕，收萝卜一枚，葡萄数枚。”

后经真定府、无极县、祁州、蠡县，只要御驾驻蹕，便有“千人持香跪迎”的场景出现，直到皇帝由新安上船改行水路，这种情况才结束。

⁴¹ (清)弘历：《御制灵应寺碑文》，选自录自《五台山碑文匾额楹联诗赋选》。

⁴² 很多相关文章中都写到了康熙皇帝敕令建造“十大黄庙”，但是其所说的具体寺庙不尽相同，作者查阅了《实录》、五台山各时期方志和碑文，均未找到此说的出处。

⁴³ 详见《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



而且在祁州驻蹕这日，《起居注》中更是记录了这样一段：“中途数千人男女老幼执香跪迎圣驾，瞻仰天颜，上遣侍卫传温旨慰谕，万姓踊跃欢腾，莫不交相谓曰，我圣主念民生疾苦，不惮勤劳，远巡边塞，我等始得天颜，自古以来此等奇遇真属罕有。”¹这段话出自谁人口中，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皇帝的态度来看，这次不但没有明喻禁止，还“遣侍卫传温旨慰谕”，可见他是接受了这种欢迎方式。

此时的山西巡抚，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满臣噶礼；而直隶巡抚，则是翰林出身的理学名臣李光地。在这次满汉大员的暗战中，李光地显然棋差一招：而后可能是受到了噶礼行为的启发，才在别驾后开始组织直隶地方的“跪迎”的。不过，直隶的地方迎接中并没有出现“万寿亭”、“诵经”、“万民衣”这类活动，而显得简单了不少。

就在这年九月，两江总督阿山在奏折中言当年丰收是因“皇帝洪福齐天，恩播遐迩”所致，康熙皇帝却在朱批中略带讽刺地责备说：“满洲姓人，仍作满洲好。如此怪诞啰嗦，何为？”²圣祖皇帝言语中，透露了对汉人阿谀逢迎的不满，他曾因此数落汤斌为“伪道学”³，也因此责骂过李光地⁴。但是这次歌功颂德的表演中，汉官还是输给了满官。

这次失败可能也令李光地不很愉快，翌年在康熙皇帝的第五次西巡中，李光地看到了噶礼迎驾背后的一些内情，于是后来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将此事悉数披露⁵：

山西巡抚噶礼，迎驾至庆都，并率百姓百余人来邀请圣驾，百姓皆夜间露立，问之云：“票押，不敢不来。”轿顶及钩琐皆真金，每一站皆作行宫，顽童歌女，皆隔岁聘南方名师教习，班列其中。渠向予辈云：“行官已费十八万，今一切贡用还得十五万。”

五 第五次西巡五台及其行程分析

关于康熙四十九年的西巡，并无相应的《起居注》记录保留，所以我们对此次行程的了解相对模糊了很多，《实录》上除了记载皇帝每日驻蹕的地点外，其他信息极为有限，而每条所记之政务也未

〈1〉 以上皆本《清代起居注册》“康熙朝”，康熙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二十八日。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两江总督阿山奏报秋收分数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下版本同。

〈3〉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汤斌称赞皇帝“旷古所无，即尧舜莫之即”，而康熙则在一番奚落后，说道：“今自夸诩为道学者，惟口为道学之言，不能实践者甚多。”事见《康熙起居注》第二册。

〈4〉 康熙二十八年南巡中，皇帝曾以老人星问李光地，李答：“老人星见，天下太平。”皇帝立刻批评道：“什么相干，都是胡说！”详见（清）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一四，中华书局，1995年。

〈5〉 前揭《榕村续语录》卷一八。



必是皇帝于当日处理的。我们只能从当时的方志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并联系当时的历史情况，作出一些简单的分析。

康熙四十九年二月初二到三月初四，皇帝第五次西巡五台山，这是康熙的最后一次西巡，也是他最后一次远距离的巡行，而在此前的三年，他都没有经行这样长途的巡行了。

此次随驾的是皇太子胤礽、皇三子和硕诚亲王胤祉、皇八子多罗贝勒胤禩、皇十子多罗敦郡王胤祜、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颺，除了皇四子胤禛，康熙储位之争的主人公们可谓齐集此行。皇帝二月初二出发，仍旧出京西房山，走涑水、易州、满城、唐县、曲阳到达阜平，由阜平入龙泉关进入五台境内，用时十一日。之后，御驾在罗睺寺、白云寺、射虎川各驻蹕一日，出龙泉关返京。御驾仍旧走唐县，南行至真定府，由无极、蠡县、祁州至新安乘船。之后舟行新苑、任丘，由霸州登岸，经固安入京，在南苑驻蹕一日后，返回畅春园。

从《实录》的记载来看，此行与以往最大的区别，就是皇帝并未从菩萨顶驻蹕。根据之前所述，皇帝每到五台，则在菩萨顶开一道场，做法事三天，这样皇帝就至少在菩萨顶驻蹕三日。而此次除了在罗睺寺驻蹕一日外，皇帝并没有在台怀诸寺过多停留，而是返回到了五台县白云寺。

通过康熙皇帝于本年十月撰写的《罗睺寺碑文》，我们大概知道了皇帝此次西巡的用意：“届兹春仲，顺合序之阳和。驾言时巡，答吾民之瞻望。暖风抽参，两歧兆黍之祥。晴雨含花，百卉壮烟霞之色。见农夫于垆上，念切勤劬。慰父老于衢中，亲加延问。”¹然而除了皇帝所说的观风问俗外，此行还有一些特别之处。

第一，皇帝由罗睺寺离开后驻蹕的白云寺，只在康熙三十七年与哲布尊丹巴驻蹕过，之后未曾再临，并非常驻之所。

第二，由现在找到的两本县志来看，其所记之西巡日程与《实录》均不相符：

乾隆《无极县志》中记载：“康熙四十九年春二月，圣驾巡省畿内，驻蹕无极二日。”²而《实录》中记载是驻蹕了一日。

而康熙《固安县志》载：“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正月十八日，上出幸五台。回銮水围毕，二月十七日自霸州交界经本邑林城诸村，于柳泉店伺候御尖营盘，十里铺搭浮桥一座，上北渡永定河，缓辔桥上，周视良久，欢动龙颜。是日，驻蹕宛平县胡林店³。知固安县臣郑善述先一日，在霸州王起营接驾。”⁴此处所载地点与《实录》相同，但是时间却差别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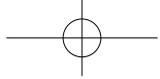
《实录》记载中，此次出巡时间是康熙四十九年二月初二到三月初四，而此处启程日期为正月

1 选自竹叶：《罗睺寺碑文》，《五台山研究》1998年第3期。

2 （清）黄可润：乾隆《无极县志》卷一。

3 此处宛平县胡林店似为固安县胡林店之讹误，清代京城附近有两处“胡林店”地名，一在宛平县斋堂附近，一在固安县。按行程与上下文来看，此处胡林店应指固安县内胡林店。

4 （清）郑善述、潘昌：康熙《固安县志》卷首。



十八日。《实录》驻蹕固安县葫林店的时间为三月初三日，而此处为二月十七日，整体行程有半月之差。康熙《固安县志》的写作时间是康熙五十三年，作者郑善述就是当时接驾的知县，他在卷首还记录了他多次接驾的经历，与《起居注》核对均无出入。而他在此行中还为皇帝设立浮桥一座，颇为骄傲，记载的极为细致，时隔不足四年，何至日期出入如此之大。

第三，康熙皇帝已多年未到五台，在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噶礼请求皇帝巡幸五台的奏折中，有言之前所奏，有“山西省民顷传闻圣主巡幸五台山之消息，不胜欢悦……其迎皇上之百姓，齐集甚多”之语，而皇帝对他的批复是：“五台地方甚窄，众人齐集则无处坐立，此事断不可。闻此朕更无心去了。”

之后，噶礼以“一连数年歉收……且圣主复幸五台拜佛，是以山西省九年丰收”为由，希望皇帝至五台山礼佛，但是皇帝的回复是：“今年事较多，不必去五台。”¹³由此可见，康熙皇帝觉得五台狭小，地方已不适合大规模巡幸，没有再临五台之意。而此年康熙皇帝随行皇子六人，为历次巡行五台之最，皇子各有扈从，人员定不在少，皇帝不避拥扰，再行五台，其中定有缘由。

不过，分析此时朝中形势，我们可作一推想。康熙四十九年二月，正是皇太子胤礽复立而未被再废之时。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初九，皇帝再立胤礽时，曾言其前所做悖逆之事是因“忽患狂戾暴易之疾”¹⁴，之后又有传言说太子暴戾乃巫蛊所致。之后，皇帝于四十八年底封赐诸王，又于四十九年初率领诸子再幸五台礼佛，而其间不做道场，只于罗睺、白云、台麓三寺驻蹕三日。康熙皇帝此行，在观风问俗的同时，很可能有借出行之机缓和与诸皇子间日益激烈的矛盾的意图。

综观康熙皇帝五次巡行五台，分别发生在国家初平之时、靖边之时、承平之时及朝内夺嫡之时，每次西巡都有特殊的背景和意义。而地方官员接待方式的变化，也是康熙朝政治转向的一个侧影。但不可否认的是，康熙皇帝对于五台山的经营，为之后国家在此建立内地黄教中心，团结蒙藏地方势力，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初九，《山西巡抚噶礼奏报盼望巡幸五台山折》。

〈2〉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七，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庚辰。

